

# 西方读懂中国“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障碍及消解之道

彭成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 北京 100732)

**摘要:**要回顾中国当前“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最集中、最权威和最凝练的表述,但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并不见得为西方所理解。这种“理解赤字”在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米特的一篇极具代表性的分析中国全球抱负的文章中就有很好的集中体现。鉴于理解和信任在国家交往中的极端重要性,文章将在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中国“平天下”智慧和愿景意义和内容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以米特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在读懂中国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意识形态偏差,并探寻相应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国外交;理解赤字;中国的全球抱负;意识形态偏差

**中图分类号:**D8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23)01-0150-11

**DOI:**10.16197/j.cnki.lnupse.2023.01.015

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且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日渐彰显之际,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提供的智慧与愿景也日益凸显其重要价值和意义。笔者将其与中国古人讲的“平天下”表述相对接,并主张要回顾中国当前“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这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最集中、最权威和最凝练的阐述,也是最值得重点关注和研精钩深的内容。虽然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平天下”智慧和方案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在过去几届党代会报告中的相关论述里就有所体现,但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并不见得为外界所重视和领会。为此,有必要深入阐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意义和内容,深入考察西方思想界在解读中国全球抱负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及存在的障碍,并探讨这种“理解赤字”可能的消解之道。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外交主张和世界愿景保持了它的一贯性和稳定性,而且中国从国家元首到各级外交人员都在不遗余力地宣讲着这些内容。虽然得益于全球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从中国获取信息的便利,国外思想界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时俱进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他们要真正读懂中国,还存在不少巨大的挑战。这种进展和挑战在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就有很好的体现。<sup>①</sup>该文章题为《中国想要的世界:权力将如何以及如何不会重塑中国的抱负》。由于文章中的许多论点在国外思想界很有代表性,本文将对这些论点进行仔细辨析与批判性思考,并围绕两个主要问题展开:一是米特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仍走得不够远;二是米特在哪些方面暴露了西方“集体无意识”的偏见,将错误的观念强加于中国。

## 一、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重要意义

在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部分进行回顾和阐发之前,有必要做两点澄清与说明。

收稿日期:2022-12-24

作者信息:彭成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副研究员,从事国际政治学研究。

<sup>①</sup>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p.161-174.

第一,是对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相关论述的重要性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和自觉。这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加以理解和把握。首先是为何要学习党代会的报告。这对于我们国人来讲或许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而且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领导得到极大加强的情况下,学习党代会的报告无疑是理解和把握中国政治生活非常根本、关键和必不可少的一个举措。其次,为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这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已有明确的表述:“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sup>①</sup>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理解,除了上述国内的考量因素之外,党的二十大也是在国际形势处于东升西降、世界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在国外各界对中国内政外交走向关注最多的时刻召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大会。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相关表述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和仔细学习阐发。

第二,是高度重视理解和信任在国家间交往中的重要性。这一点需要澄清和说明,是因为在当前的竞争之世,实力和地位等现实主义因素被普遍认为是国家间交往的决定性考量因素,但是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被誉为古代中国人“圣经”的《论语》开篇就写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当前中国在世界的处境:她不仅没有得到外界很好地理解,甚至还遭受到很多不实的揣测和指控,特别是来自西方,但是正如中国另外一部古籍《左传》所言:“信不由衷,质无益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信任,那么即使有抵押,也是没有帮助的。这种对理解和信任的重视在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失斧疑邻”寓言故事中就有体现,其表明主观偏见和先人之见很可能成为通往客观真理或现实之路的障碍。这种智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

因此,中西方要进行真正理性和有建设性的对话,关键是需要抛开所有关于对中国的成见或者先入为主的观念。然而事实是,当外界有这么多关于中国全球抱负的讨论和投射甚至指责时,西方一些引以为傲的理想性价值规范正在逃离西方抵达东方,并最终在中国开花结果。

## 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主要内容

首先,有必要对“平天下”的概念进行一个初步考察。“平天下”作为一个词组被引用最多的是作为四书之首《大学》中所列的三纲八目之最高理想。众所周知,“三纲”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八目”则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八目”不仅是《大学》这部经典的核心,而且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儒家整套思想和实践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其中的“平”通常来说包括“平定”“治理”“和平”“和好”等意。在这个意义上,“平”和“太平”常常可以通用,并常见于儒家经典。如果更进一步,将其推进到哲学层面,那么会发现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主干的道家已经将“平”上升到一种终极理想的境地,这从如下一些表述中即可见一斑:“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庄子·德充符》);“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庄子·刻意》);“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庄子·天道》);“欲静则平气”(《庄子·庚桑楚》);“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庄子·盗跖》);“虚者中无载也,平者心无累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圣人能遗物反己”(《文子·道原》)。这里限于篇幅不去深入辨析其中的微言大义,只是指出道家对“平”的哲学解读和儒家治国理政的三纲八目是不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是为后者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其次,我们应该清楚“平天下”何以适合指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我国外交和世界愿景的内容。一方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页。

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sup>①</sup>并且在未来的征程中,明确将“坚持胸怀天下”上升为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原则。其中,报告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了中华民族谋复兴,也包括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而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sup>②</sup>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福建考察来到朱熹园时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sup>③</sup>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外交和世界愿景的内容与古人讲的“平天下”对接也可以看作是这种结合的一种尝试和体现。

最后,在辨析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的内容方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加以理解和把握。

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党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因为一切战略规划和外交部署都需要依据对形势的判断,对世情的判断自然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阐述中国外交思想和世界愿景的第十四章节的开篇就写道:“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与党的十八大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去掉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表述和判断,并增加了“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表述和判断。这也再次印证了前述二十大召开节点的重要性的观点。

第二个层面是有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原则和内容。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此原则指导下,我们始终坚持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中国的外交立场和政策,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并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sup>⑤</sup>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这方面我们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各国利益汇合点;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sup>⑥</sup>三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方面中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6页。

③ 张岂之:《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人民日报》2021年4月7日第8版。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1页。

国坚持勇扛经济全球化大旗,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坚持包容性发展,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sup>①</sup>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包括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sup>②</sup>

第三个层面是中国基于五千年文明向世界提供的愿景。这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此,我们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sup>③</sup>与此同时,我们也向世界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呼吁,希望能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sup>④</sup>

可以看出,上述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我国“平天下”智慧和愿景的内容。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迈向天下太平愿景的前提和基础,深入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则是针对具体世情条件下实现世界愿景的途径和保障,而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景则是中国外交的目标和动力。当然,上述主要还是中国一方的主观立场和观点,其实际效用同样受制于他国对其的理解、认同和互动。然而正如下一节将要阐述的,西方在读懂中国“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方面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总的来说还有不小的距离,并急需寻求解决方案。

### 三、西方在读懂中国“平天下”智慧与愿景方面的进展

作为牛津大学历史系的知名教授,米特在《外交事务》发文阐述中国的全球抱负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进展,标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也在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学科以及美国地域的局限,开始将视野转向历史等人文领域,以及比美国视野更具历史文化深度的欧洲视角。相应地,米特在文中提出不少观点都较之前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都还走得不够远。这一节就将对这些观点进行系统梳理、盘点和分析。

#### (一)对中国的解读体现更多的是观察者的偏见

米特开篇便正确地指出,“中国是否想通过改变国际秩序来促进自己的利益,烙下自己的印记?这可能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它所引出的答案倾向于更多地反映当下的偏见,而非未来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模样”,这是因为“这些预测过于僵化和笼统,无法有效描述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既不能捕捉到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1页。

<sup>②</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2页。

<sup>③</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3页。

<sup>④</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3页。

中国未来目标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也不能识别出那些塑造了中国抱负的基本要素”。<sup>①</sup>这里的“预测”,米特想到的是“一个恶意的、扩张主义的中国”和“不那么世界末日的观点”,因为后者强调中国政体的包容性特征和政权内部面临的巨大挑战。<sup>②</sup>

然而,这里米特的问题在于他提出的作为解决方案的ACGT模型,即“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全球抱负(global ambitions)和技术(technology)”。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犯了“五十步笑百步”的错误。米特尤其强调其中“威权主义”作为塑造中国未来全球姿态的最主要力量,以及成为改善中西方关系的最大障碍。然而,这种将中国与西方视为“威权主义VS自由主义”的二分法却是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它超出合理怀疑和反思的限度。这种二元论本身就是西方了解中国和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最大障碍。此外,它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变化的维度,而这正是中国认识论所擅长的,比如《易经》最重要的智慧就是对变化之道的揭示。

## (二)中国领导层的历史感

米特正确地捕捉到了中国领导层的历史意识,但对历史的追溯还不够深远。其结果是米特只着眼于近代中国史以及中国领导层的一些相关阐述的细微差别。比如他批评中国是“以修正主义的姿态宣称中国是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奠基人之一”,“但为了运用这样的历史,执政党需要对中国历史进行宽泛的重新解释,即现代中国的开端不是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sup>③</sup>这类类似于各种对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批驳观点,他们对于其背后的宏大历史逻辑“是决然没有那份挑剔的毅力、那份透视的慧眼去加以把握的”,只能是抓住一些斯宾格勒可能忽略或存在错误的历史细节“开火”并紧咬不放。<sup>④</sup>

对中国领导层的历史感,国人应该并不陌生,这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大历史观”以及在鸟巢边上建成宏伟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就可见一斑。事实上,中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记录,而且无疑是世界上在日常思考 and 实践中历史感最强的国家之一。这也让我们想起排在古代四书之首的《大学》中所言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智慧。《汉书·艺文志》也主张“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术也”。无独有偶,目前中国正在兴起一种历史政治学及一种长远的文明观,都旨在从中国长远的历史和文明脉络中去把握和审视当下。<sup>⑤</sup>

但是从米特的论点来看,他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领导层的那种千秋万世一贯的历史感,以及为何我国宪法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不难理解《庄子》开篇提出的小大之辩的寓言故事。在庄子看来,不同的历史视阈其实是很难进行对话的,这与我们平常所说无须与“三季人”争辩的道理一样。其实这也不局限于时间的维度,正如庄子所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米特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近代中国历史学家,他对中国领导层的历史感有了部分正确的认识,但还远

①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161.

②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161.

③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164.

④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46页。

⑤ 参见陈立新:《世界变局与历史观的复兴》,《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杨光斌:《历史政治学的知识主体性及其社会科学意涵》,《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谢茂松:《展望2021年的中国:熔旧铸新的文明脉动》,《中国评论》2021年1月号,总第277期;彭成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哲学省思——兼论中西历史文化遗产与政治文明的本质差异》,《学术界》2021年第9期。

远不够。这或许也正应了尼采的洞见,正如其在《道德谱系学》中所揭示的那样:“这场反叛(道德上的奴隶叛乱)背后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今天它已经移出我们的视线,因为胜者为王……——但是您不明白吗?您没有眼力去观察花了两千年才取得的胜利?……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所有冗长的事物都很难看到,也很难看到其全部。”<sup>①</sup>

### (三)中国的正当目标有所提及

米特将中国的正当目标纳入考量是很值得称赞的进步,尽管它不是基于正确的理由,而且基本上回避了对实质内容的讨论。<sup>②</sup>米特提及“中国的正当目标”与其说是出自同理心,不如说是出于实力的考量,正如他解释道:“中国毕竟是一个强大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规模的国家不可能仅仅按照其竞争对手的要求来参与全球秩序——尤其是因为中国最近的一些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的失败。”<sup>③</sup>按照这个逻辑,其他规模较小、实力更弱的国家似乎就不应该提出他们的正当目标。这可能让我们想起2021年3月中美双方高级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的战略对话时杨洁篪批评美方“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的原因所在。<sup>④</sup>事实上,我们需要考虑中国的正当目标,不仅因为它的独立主权地位,而且因为其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至于缺乏实质内容,是因为米特并没有进行讨论,而是转向表达希望北京能更富创新性和更好地吸纳来自国内外的批评意见,并发展出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政体。<sup>⑤</sup>

### (四)中国不搞意识形态输出

米特正确地指出“北京并不寻求将其体制强加给其他国家”,但宣称“中国在亚洲日益提升的地位可能会导致该地区民主国家权威倾向的增强。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民主体系脆弱的国家,如缅甸和泰国,政治钟摆会转向非民主的一边”。<sup>⑥</sup>事实上,中国不搞意识形态输出在西方观察家中被广泛接受,因为很少有反面的实际证据支撑。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只闻来学,未闻往教”的治国理政理念是相通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儒、释、道共享的智慧。然而,第二部分关于中国的影响会使其他国家的政治天平朝非民主方面倾斜却只能在“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的二元论框架下才有意义,而后者是西方制造的最大“神话”,也是中西关系发展和改善的最大障碍。这个框架充满了价值判断,并且是潜意识中影响西方正确解读世界事务的最大障碍。本文也将在后面对这一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 (五)未来政治的开放和封闭因素

在主张“未来几十年,中国的政治机制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将揭示出中国社会开放元素与封闭元素之间的差异”时,米特确实展现了一定的前瞻性。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鼓励中国学术界、商界和法律界的年轻专业人才出国留学。但在党的队伍中,拥有海外经历并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甚至会损害一个人的晋升前景。在中国下一代政治领导人中,似乎很少有人具有重要的海外经历,尽管无疑他们会获取有海外经历

<sup>①</sup>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Trans. Maudemarie Clark and Alan J. Swensen,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1998, pp.16-17.

<sup>②</sup>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169.

<sup>③</sup>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169.

<sup>④</sup> “杨洁篪: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这样说话”,央视网, <https://v.cctv.com/2021/03/19/VIDE0f10QxWS0SPXx AaK1Jw210319.shtml>,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30日。

<sup>⑤</sup>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p.170-171.

<sup>⑥</sup>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172.

人士的咨询建议。中国很可能会培养出一群内向型的政治精英,与其相伴的是一群拥有全球人脉、外向型的专业精英。这种反差将带来一个重大挑战,如果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因为这一反差暗示出了两个关键目标的矛盾性,即国际化和维护党权力的矛盾。<sup>①</sup>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国际化与维护党权力”之间存在矛盾的结论是明显牵强和主观臆造的。中国共产党在言行两方面都是一以贯之地坚持开放和国际化的政策的。此外,正如后面将要讨论的,西方认识论可能擅长于研究静态的事物,但不擅长研究动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米特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对未来的发展提出进一步可靠和准确的预见。事实上,中国从长期的历史中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开放就繁荣,封闭就落后”,而且21世纪中国的大门必将越开越大,这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 四、西方在读懂中国“平天下”智慧与愿景方面的障碍

##### (一)威权主义作为目的本身与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米特声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的威权治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通往自由政体的垫脚石。中国共产党坚称这是一种贤人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新自信和对外强硬标志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对此前的一种更加犹豫的威权主义版本的重大偏离,在此之前的中国领导层甚至将新加坡的民主模式(尽管也不够完美)视作潜在的学习模型”。<sup>②</sup>这个断言有几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中国领导层从来没有明确甚至暗示中国的治理体系是“贤人政治”(meritocracy),更谈不上“威权主义”,所以这些描述性概念是西方观察家在没有经过严格审视其根据的情况下从外面投射到中国的。如果我们能避免使用这些似是而非而又先入为主的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仔细地对待中国自己提出的政治概念。这包括一个宏大、完整而又复杂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心,而最近强调比较多的是“人民政治”的话语体系。

第二个类似的错误就是断言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中国领导层将新加坡的民主模式(政治)视为潜在的学习模式。这显然也是一厢情愿。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应该放在何处呢?这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三个更细微的错误在于人为地将党的十八大作为中国内政的一个分界线。事实上,正如米特在上述引言中自己指出的那样,中国内政的一些变化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就已经开始,所以将领导层在党的十八大时的更替视为中国内政变化的分水岭是极其主观和随意的。当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内政外交确实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变化,而这牵涉到一个如何解读的问题,下面就将提出一种可能的解读,以正视听。

#####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威权转向与党领导弱化的“再平衡”

米特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政治变化的误读。正如他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美国或其他对手的敌意,而是自身的威权主义转向。北京这一方面的方向,使其消费主义、全球抱负和技术——更难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因其易在国外激发敌对情绪,并增加它想要改变世界秩序的难度。他又指出:自2020年初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日益强硬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也并非不可能想象一个不那么敌对的威权主义中国: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出现了调查性新闻的蓬勃发展、不断扩大的市民社会,以

<sup>①</sup>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173.

<sup>②</sup>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162.

及活跃的社会媒体,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虽然没有完全民主化情况下的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尽管中国共产党不大可能转变为一个自由民主政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回到早先的路线。那种2012年之前的威权主义中国对国内外观众来说都不那么刺眼。<sup>①</sup>

上述分析和观点存在若干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对2012年之后中国政治“威权转向”的武断,尽管作者在那里使用的概念并不一致和准确。似乎他指的“威权转向”是从“不那么对立的版本”转向对立的版本。这种不严谨和不负责的概念使用,再加上“好斗”“对抗”等其他带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词语,使得米特明显与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的教义和智慧背道而驰。后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智慧中则体现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和优良传统。要求西方观察家达到儒家的理想道德标准可能有点苛刻,所以我们或许应该专注于这里的解释错误。诚然,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国内政治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措辞和解释大相径庭。一个容易刺痛西方神经的明显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不断加强。不应该忘记的是,中国政治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中华大地上每一位公民都享受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各种自由,以及史无前例的丰饶的物质基础。

回顾中国共产党对不同时代“主要矛盾”的判断或许可以为我们的理解提供有益线索。“主要矛盾”是大多数中国人从学生时代就耳熟能详的概念,但西方很少有人对这个看似晦涩难懂的政治术语有清醒的认识。尽管米特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它,但他似乎并没有掌握其背后的逻辑和治国智慧。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辩证唯物主义来解释世界,将矛盾视为社会中无所不在并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因此,“主要矛盾”是定义一个时代社会的最基本矛盾;通过识别和解决它,社会就顺利向前发展,否则会导致挫折甚至混乱。因此,对“主要矛盾”的研判非常关键,并具有极为重要深远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之后则演变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时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回溯以往变化,它们都很好地捕捉了特定时代社会的特征和主要任务。进入新时代以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这些需要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因此,习近平新时代的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个主要矛盾展开的。最近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支持浙江省在探索 and 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做先行者,也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的转变称为“威权转向”不仅非常不切合实际,而且暴露了西方认知的局限性以及共情能力的缺失。以下将要讨论,这种理解差异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外交变化的解读。

### (三)中国“好斗”的外交政策与自信积极的外交政策

与米特称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为“好斗”不同,一个更为中性并在西方流传更广的概念是“assertive”。这个概念并不好翻译,兼有武断、强硬和自信的意思,这里选择“自信积极”作为对应词汇,但是思想界很少看到一个相对客观的对这种转向的分析。这里限于篇幅,也只是简单说明一下三种外交风格的差异,即“被动消极”“自信积极”和“自负激进”,并指出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外交转向应该视为从“被动消极”的外交风格向“自信积极”的外交风格的转变。

“被动消极”的外交政策往往意味着更多地服从他国的意愿,并可能损害其民族权利和自信心。就像在个人层面一样,遵循这种风格的国家并不认为自己与强者是平等的,因为它们更看重强者的权利、愿望和感受,无论是出于被强者喜欢的需要,还是出于实力差距的考量。这可能会导致对真实想法或感受的沟通失败,并导致强者优越感和傲慢心的膨胀。心理学上的一个常识是,当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被动地回应时,他(它)们会以不那么积极的方式表现自己或以某种方式贬低自己,当这成为习惯之后,就会产生自卑

<sup>①</sup>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171.



感、低自尊心、不自信等,并成为恶性循环反复出现,从而加剧这种状态。与“被动消极”的外交风格不同,“自信积极”的外交政策意味着能够以平静和积极的方式维护自己或他人的权利,而不用激进或被动地接受不公的对待。自信积极意味着可以直接、诚实和适当地表达思想、感情和观念去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损害他人的权利。其中“无损他人”的内涵是这种外交风格与自负激进的外交政策风格的最大不同之处,因为后者主要特征是不予或不能考虑他人的观点和感受。那些表现得咄咄逼人的自负激进者很少表现出对他人的赞美或欣赏,并且往往会因为傲慢的理由、幻想或缺乏同理心而贬低他人,从而走向极端,要么自负激进,要么被动消极。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进入新时代正是伴随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过渡,相应地,新时代中国的外交风格也在从“被动消极”的风格向“自信积极”的风格转变,而西方的外交政策则是被自负激进的风格主导。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外交风格转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就已开始显现,而不是进入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西方既不了解中国的这种外交风格转变,也不习惯中国的这种变化,因此米特建议中国退回到“不那么刺眼”的“2012年之前可见的中国”,并要求“中国必须使其全球抱负对他人是愉悦的”,而方式则是做出“更大的让步、慷慨和接受批评的意愿”,这些在米特看来都是中国承担全球领导力所需要的。<sup>①</sup>

中国这种外交风格的转变以及美国对其背后深层逻辑在理解上的欠缺:在2021年3月的中美阿拉斯加战略对话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会谈开幕对媒体开放的第一天,世界看到双方非常严厉地相互指责,其中中方指责美方“傲慢与虚伪”,而美方则指责中国“威胁维护全球稳定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构成挑战。对于一些清醒的观察者来说,这非常符合这里揭示的逻辑。或许没有必要提及美方对其实力和规范的优越感。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美方在会谈前采取的一系列小动作,包括对中国高官的制裁,对中方代表外交接待的降级,以及会谈空间分配不均匀等,都印证了美国的“傲慢和虚伪”。当然,违反外交礼仪还是相对次要的,更要紧的是美方对其价值观深入骨髓的自负。这其实是杨洁篪明确表示美国及其盟友不能代表全球舆论,并指出“美国现在需要的,是改变自己的形象,而不是推广自己所谓的民主”<sup>②</sup>的原因。这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外交政策中“自负激进”的部分。可惜美国缺乏这样的反省和自我认知,所以谈判不得不以火药味十足的相互指责方式开场。对于此后的闭门对话,中方代表将其描述为“坦率的、建设性的、有益的”,而一位美方官员则称其为“实质性、严肃和直接的”。<sup>③</sup>这是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一个很好的写照,但如果没有中方的据理力争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历史性的视角也应该用于解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相互的指责和敌意的升级等情况。

## 五、西方对中国“理解赤字”的消解之道

在今天的西方,没有哪一天没有关于中国的文章或者著作问世,这表明中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正如前面对米特文章的深入“解剖”,西方虽然在理解中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如果我们衷心希望中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那么我们就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消除这一障碍。为

<sup>①</sup> Rana Mitter, “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Reshape Chinese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pp.171-173.

<sup>②</sup> 《美中2+2高层战略对话实录》,2021年3月22日,中时新闻网,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322000068-260301?chdtv>,访问时间:2021年7月3日。

<sup>③</sup> “杨洁篪:这次战略沟通是坦率的、建设性的、有益的”, <http://finance.sina.com.cn/7x24/2021-03-20/doc-ikkntiam5715087.shtml>,访问时间:2021年7月3日;“US and China trade angry words at high-level Alaska talks,” BBC News, March 19th, 2021, retrieved on July 3rd, 2021 at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56452471>.

此,下面将不揣浅陋提出一些思考和改进建议。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而言,在认知方面,西方需要重新认识、反省并摆脱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偏见。如上所述,一些偏见可能植根于超出简单理性审查所及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对自由民主具体、排他性和狭隘的理解以及狂热的推广和输出就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偏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办法“抓住”并摆脱这些“集体无意识”的偏见。可以想象的解决方案是诉诸并因此欣赏非西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中的智慧与洞见。这就要求西方进行一场认知革命,并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这个过程也注定是痛苦的,正如不少有远见的哲学家经常指出的那样,“真理很少是甜蜜的。”<sup>①</sup>另一种解决方案是转向西方传统中成功摆脱其偏见与不足的一些远见卓识者的智慧和洞见,比如尼采、歌德、康德、马克思、霍布斯、叔本华、斯宾格勒等。这里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康德对西方理性认知传统的批判和警告,“如果运用得当,知性会产生真实客观的知识,但另一方面,知性也会产生幻象。”<sup>①</sup>所以康德最著名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就在于给西方的理性认知传统划定其合理的边界。确实,西方应该为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和对人类的丰富知识贡献感到自豪,但是这种自豪不应超越其正当范围而转变为自负和傲慢,不管是内化于心,还是外化于行。至于实践方面,期待西方在思想上出现“顿悟”并体现在外交变化中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或许更应该期望西方能开始真正平等地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展开对话,不管这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

对中国来说,本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无怨矣”,或者我们党的“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这里也提出一些仅供思考的建议。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指出的那样,“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所以我们在分析中西方表面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时,都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而应该深入更为本质的层面加以理解和把握。从这个角度去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展示的“平天下”智慧与愿景是中国当前各界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我们每个个体对其的理解有可能也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所以需要不断学习并切实增强领悟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对时代的局限怀着一种开放和谦卑的心态。放到中华民族跨越五千年的伟大与复兴轨迹的大历史观中去审视的话,我们从长期占据世界之巅到经历近代的触底反弹,到现阶段的平视世界,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的历史方位离反弹到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最高点还有距离。后者的一个指针按照古人的说法应该是“近者悦,远者来”“日月丽天,群阴偃服”。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认知也就不一定能跳出我们所处时空的局限。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聚焦主业,苦练内功,加快迈向民族复兴的更高阶段和最高点。这不仅意味着更大的自信,更多地拥抱基于传统天下观的世界主义,更加虚怀若谷地拥抱外界的批评,以及对外界感受更强的敏感度和考量。更加自信的中国就能少一些针对西方的误解或恶意指责而生发的情绪化反应。这也意味着中国可以少一些民族主义,多一些对世界主义的拥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多这方面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以及更进一步对他者的欣赏,这正是《中庸》中所言“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的真意所在。对他者感受更加敏感和更多考量也是响应中国古人所言政治应该效法天道“与物为春”(《庄子·德充符》)的智慧。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升级,中国应该意识到,外界的关注和一些批评也并非毫无根据。为了实现这样一种“更上一层楼”,也可以叫作思想启蒙或精神觉醒,中国需要加快从聚焦物质层面到精神文化层面的转变,即从过去几十年以“先富带后富”为中心工作和任务向未来几十年以“先觉觉后觉”为中心工作和任务的转变。中国领导层已经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在每个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下切实实现这一目标。西方也应该采取行动和态度,以更大的耐心支持这种转变。

如果上述建议能够被双方采纳,那么中国提出的“平天下”智慧和愿景也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实现基础。

<sup>①</sup> [英]罗杰·斯克鲁顿:《康德(牛津通识读本)》,刘华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53页。

当然,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就目前情形来看,西方的任务似乎更紧迫和艰巨,因为西方处于“进攻”一方,而中国则处于不得已的防御状态。西方主流能否真正理解并领会非西方世界和西方传统中那些“异端”思想家的智慧和洞见还不得而知,但要从根本上和平解决中西方的分歧确实别无其他更好选择。回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20世纪80年代就对西方发出的警告:一个附在西方心灵上的“石化盔甲”已经阻止他们倾听来自非西方的声音,只有“巨大事件的无情重击”或可以打破它。在一些人看来,世纪之交发生的“9·11”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巨大事件的无情重击”,但很可惜的是它不但没有敲碎西方心灵上的“石化盔甲”,反而激怒了美国满世界地寻找并摧毁他们眼中的“怪兽”。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也可以看作这么一个巨大的事件,但是似乎力量也是有限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以牙还牙、冤冤相报的结果,所以我们衷心期待双方都能运用各自的智慧去践行并实现中国提出的“平天下”的愿景,现在这一重任则落到我们每一个人肩上去推动实现这一伟大而崇高的目标。

## Obstacles and Solutions of the West to Understanding China's "Pingtianxia" Wisdom and Vision

PENG Chengyi

*(School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National Global Strategy Think Tank,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o review China's current wisdom and vision of "pingtianxia",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ains the most concentrated, authoritative and condensed expressions, but the words and meanings in it are not necessarily understood by the West. This "understanding deficit" is well illustrated in a represen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global ambitions by Mitter, a history professor at Oxford University. In view of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this article seeks to deeply examine the progress and ideological bias in understanding China in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circles represented by Mitter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content of the wisdom and vision of China's "pingtianxia"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further explore corresponding resolutions.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diplomacy; understanding deficit;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s; ideological bias

【责任编辑 孙 琰】